

晋宋社会文化史论

HISTORY OF SOCIAL IN
THE JIN AND SONG DYNASTIES

王永平 / 著

| 优 | 势 | 丛 | 书 |

海外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南宋社会文化史论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SONG DYNASTY

陈学远·著

（ 第 一 版 ）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优 | 势 | 丛 | 书 |

晋宋社会文化史论

HISTORY OF SOCIAL IN
THE JIN AND SONG DYNASTIES

王永平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宋社会文化史论 / 王永平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5

(优势丛书)

ISBN 978-7-5201-2423-2

I. ①晋… II. ①王…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23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8748 号

优势丛书

晋宋社会文化史论

著 者 / 王永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孙燕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423-2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扬州大学“优势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夏锦文 周新国 姚文放

委 员 （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平	田汉云	华清君	刘拥军
吴善中	张 清	柳 宏	胡学春
俞洪亮	秦兴方	钱玉林	钱宗武
蔡宝刚			

总 序

2014年5月，扬州大学的“文化遗产与区域社会发展”学科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本优势学科以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法学三个一级学科为依托，由经典诠释与传承研究、文艺理论前沿与区域雅俗文化研究、传统学术与江苏地域文化创新研究、淮扬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法律文化与区域法治发展研究五个主要学科方向组成。

本优势学科的宗旨，是紧紧围绕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江苏文化强省战略，追踪学科前沿，造就领军人才，面向国家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推进优势学科的建设。首先，是促进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开辟学科新方向与科研增长点。凸显本学科原有特色，强化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通过协同合作、跨越发展，显著提升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其次，是充分发挥学科整体优势，产生具有显著效应的高水平学术成果。交叉整合学科现有资源，加强与国内科研院所和地方文化部门的协作，集中力量，协作攻关，纵贯古今学术，会通中西文化，深入把握雅俗文学嬗变与地域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再次，是强化学术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建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体系。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面貌、特质、形态、规律，进一步开拓区域社会发展的研究路径和研究领域。最后，是探索服务区域社会的运行机制，发挥服务区域社会的实际功能。积极发挥高校人才高地优势，多元探索社会服务途径，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应，多方位、多维度、多层次地为区域社会、文化和法治发展服务。

在上述诸多工作中，本优势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出版一套系

列丛书。拟以两年为一期，每期 15 种；四年两期共 30 种。考虑到与“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相一致，取名为“优势丛书”。

回顾以往，扬州大学文科的重点学科建设经历了曲折而璀璨的道路：2006 年文艺学学科获批“十一五”江苏省重点学科；2011 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获批“十二五”江苏省级重点学科；2012 年中国史学科获批“十二五”江苏省级重点学科。而 2014 年“文化遗产与区域社会发展”获批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则是在以往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基础上更上层楼。其间，扬州大学承担了参照“211”工程二期项目“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和参照“211”工程三期项目“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的建设，在这两期项目中均有大型丛书的建设任务，前者为“扬泰文库”，共四个系列，计 90 种图书；后者为“半塘文库”和“淮扬文化研究文库”两个系列，计 50 种图书。这两套大型丛书的出版，有力推动了扬州大学文科各学科科研质态的优化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对主涉学科后来获批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功不可没。

如今作为优势学科建设的重头戏，又面临着新的大型丛书“优势丛书”的建设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不敢稍有懈怠，矢志全力以赴，将团结学科团队全体成员，像以往一样，出色地完成“优势丛书”的出版工作。

最近，“江苏省‘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指出：到 2020 年，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总目标下，将继续大力支持江苏高校优势学科的建设，以提高江苏省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我们将不遗余力，乘势而上，借助以往学科建设的经验和实践，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和卓著成果，为新一轮优势学科的建设奠定扎实的基础。

“优势丛书”的问世，汇聚着教育部、江苏省教育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位审稿专家的大量心血，凝聚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扬州大学“优势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6 年 8 月

目 录

第一章	西晋时期士风之任诞及其批判与反省思潮·····	1
一	引言：对西晋士风及其政治危害的一般看法·····	1
二	西晋时期任诞、淫靡士风之盛行及其表现·····	4
三	西晋时期对玄化任诞风气的批判思潮·····	12
四	西晋灭亡过程中玄化任诞名士的痛苦反省·····	22
第二章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26
一	东晋之初玄化名士群体的忧愁心态及其任诞作风的延续·····	26
二	士族社会执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批评与矫正·····	33
三	出自寒门的法术之士对玄化浮诞风气的激烈批评·····	41
四	崇尚儒学的经史学者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	43
五	东晋时期反玄风思潮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	50
第三章	晋宋之际谯国戴氏家族之门风与文化	
——	以东晋隐逸名士代表戴逵为中心的研究·····	56
一	关于谯国戴氏之侨居地及其家族门第问题·····	57
二	“一门隐遁”：谯国戴氏崇尚“通隐”之门风及其表现·····	65
三	“巧艺靡不毕综”：戴逵父子之文艺才能与思想风貌·····	73
第四章	宋武帝刘裕“微时多符瑞”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85
一	刘裕“微时多符瑞”的主要内容及其表现类型·····	85

二	刘裕“微时多符瑞”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政治意涵	98
第五章	宋文帝对皇族子弟之训诫及其局限	104
一	宋文帝之雅化及其重视皇族子弟之文化教育	107
二	宋文帝对皇族子弟有关军政活动与生活作风之训诫	113
三	宋文帝对皇族子弟训诫之局限及其失败	122
第六章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	130
一	北府势力之崛起与京口学术文化地位之提升	130
二	晋宋之际京口地域之文化家族与寒门学人	135
三	京口地域学人的社会群体特点与学风特征	149
第七章	刘宋时期门第寒微学人群体之兴起及其原因	163
一	刘宋时期门第寒微之学人群体及其学术文化表现	164
二	刘宋时期寒门学人之学术风尚及其群体兴起之缘由	187
第八章	东晋中后期佛教僧尼与宫廷政治	194
一	引言：从相关批评看东晋中后期佛教僧尼生活之世俗化 现象	194
二	东晋中后期帝王、后妃与佛教僧尼的密切交往	196
三	东晋孝武帝时期建康僧尼对宫廷政治的干预及其影响	201
第九章	刘宋时期佛教僧尼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209
一	佛教僧尼与刘宋宫廷的密切关系	210
二	佛教僧尼参与刘宋宫廷的权力斗争	213
三	刘宋藩王与郡守等召集僧尼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	219
四	余论：佛教僧尼的“术士化”及其对刘宋社会舆论与政治的 影响	225

第十章 魏晋南朝士族社会之女教与“母教”

- 从一个侧面看中古士族文化之传承…………… 229
- 一 魏晋南朝士族社会普遍重视女子教育…………… 230
- 二 魏晋南朝士族社会之“母教”…………… 238

附论：“笑乱男女之大节”：魏晋时期“谑戏丑褻”之风尚

- 兼论魏晋妇女之淫逸妒忌风尚…………… 255
- 一 “命妇出宴”与“戏妇之法”：汉魏之际男女交往之黷乱礼法现象…………… 257
- 二 “任达不已”与“对弄婢妾”：魏晋时期上层社会之“谑戏丑褻”风尚…………… 262
- 三 “任情而动”与“妒忌之恶”：魏晋间上层社会妇女之淫靡风尚…………… 275

- 后 记…………… 285

第一章 西晋时期士风之任诞及其批判与反省思潮

一 引言：对西晋士风及其政治危害的一般看法

魏晋以来，玄学思潮蔚然成风，对当时的士风产生深刻的影响，以致当时以士族社会人物为主体的名士多放荡不拘，任情纵性，浮诞之风极为盛行，对传统的儒家礼法制度造成了激烈的冲击。这一风气，在西晋元康年间达于极盛状态，而此时西晋社会风尚也极为淫靡，政治统治腐败不堪，不仅统治集团内部相互残害不已，而且面对边地诸胡的内迁，节节败退，终于酿成了中原沦陷、西晋灭亡的严重悲剧。对此，东晋前期史家干宝在《晋纪·总论》中除了指出西晋统治“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的因素外，其士族社会弊风也是一个重要的危害性因素，并对此进行总结和批评。

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机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愿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

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长虞数直笔而不能纠。其妇女庄栉织组，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妬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黷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①

同时的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卷二七《刺骄篇》中指出：“余观怀、愍之世，俗尚骄褻，夷虏自遇。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他们都经历了两晋之际的巨变，其感受自然是真切而深刻的。《晋书》卷九一《儒林传序》说：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这是站在维护儒家传统的立场上，对玄学风气所作的批判，指出西晋之亡与东晋之衰在于士风堕落。

西晋主流士风是如何影响到社会政治之兴衰的呢？对“魏晋清谈”与“清谈误国”之间的内在联系，陈寅恪先生曾有细致的辨析。他曾指出：“魏晋两朝清谈又不是同一面貌，同一内容”，他认为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为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

^① 《文选》卷四九《史论上》。又见《晋书》卷五《孝愍帝纪》史论所引，而文字略有不同。

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换言之，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而东晋一朝则为清谈的后期，“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陈先生指出阮籍、嵇康等反抗司马氏篡魏，是“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当时人物对名教与自然主张的不同，即是自身政治立场的不同”。尤其是阮籍的行为最为典型，他虽仕于司马氏，但不以实际政务为事，行为放荡无拘。阮籍言谈谨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从而将“东汉末年党锢名士具体指斥政治、表示天下是非的言论，一变而为完全抽象玄理的研究，遂开西晋以降清谈的风派。然则，所谓清谈，实始于郭泰，成于阮籍”。西晋立国后，玄学名士将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对立、冲突的关系进行调和，从而使他们“自可兼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既享朝端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而无所顾忌”。可见当时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之所以成为清谈核心，实有其政治上的实际意义，必然给当时政治与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①由此可见，阮籍等清谈玄理本为避世，但西晋执政人物则以此入世，“兼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既享朝端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这必然导致士风的淫靡与腐败。所谓“清谈误国”，正是就此而言的。

基于陈寅恪先生的分析，我们明白，西晋名士社会之崇尚玄虚、精神堕落、行为失范，如在小圈子中流行，未必能危害整个社会，关键在于这些所谓的名士借助于西晋门阀制度的护佑，不仅居于政治高位，而且不以世务为怀，从而导致政治的腐败。因此，魏晋之际，面对玄化思潮之勃兴和任诞风气之盛行，同时出现了激烈的批评意见，试图予以纠正。对此，以往人们虽从不同角度与层面间有涉及，但少有系统论述，这里试作一专题考察，从一个侧面透视西晋的士林风尚。

①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黄山书社，1987，第46、53、56、59页。

二 西晋时期任诞、淫靡士风之盛行及其表现

自汉末以来，仕林之新风气已在酝酿之中，其根源在于一些名士自觉地以率真自然的人生态度抵制儒家礼法制度的普遍虚伪化状况，冲击僵化的礼法教条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曹魏立国，其寒门统治者的社会阶层及其文化特征决定了其对儒家礼法制度的敌视态度，其通过一系列用人制度，对传统士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是汉晋之间士风变化的潜在背景。此外，其间政局急剧变化，王朝更迭频繁，历代统治者多对任情纵性的名士领袖采取杀戮政策，以其鲜血作为新政权的祭奠，汉魏之际的孔融、魏晋之际的何晏、嵇康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这对新士风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其结果必然造成名士群体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和回避，以完全自我的消极态度来对待人生与社会。对此，清人王夫之的一段评论颇为深刻，他在《读通鉴论》卷一二“晋惠帝”之一条中说：

夫晋之人士，荡检逾闲，骄淫懦弱，而名教毁裂者，非一日之故也。魏政之综核，苛求于事功，而略于节义，天下已不知有名义；晋承之以宽弛，而廉隅益以荡然。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名教为天下所讳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为耻。其以世事为心者，则毛举庶务以博忠贞干理之誉，张华、傅咸、刘毅之类是已。不然，则崇尚虚浮，逃于得失之外以免害，则阮籍、王衍、乐广之流是已。两者交竞，而立国之大体、植身之大节，置之若遗；国之存亡，亦孰与深维而豫防之哉？……董养升太学之堂而叹曰：“天人之理既绝，大乱将作。”诚哉其言之也！

这里指出西晋“荡检逾闲，骄淫懦弱”士风的社会政治背景，可谓一言中的的。

西晋名士社会就其生活态度与言行方式而言，主要模仿以阮籍等为代表的魏晋之际名士群体。《晋书》卷四九《阮籍传》载阮籍之作风主要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遗落世事”，二是“不拘礼教”。关于前者，本传

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如他听说步兵厨营有人善于酿酒，于是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关于后者，其事迹甚多，本传载：“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当时礼法人物有吊丧者，阮籍或“散发箕踞，醉而直视”，甚至“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见同好，“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关于阮籍居丧不守礼，《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尽管受到礼法之士的攻击，“籍饮噉不辍，神色自若”。其在家庭伦理方面也如此，《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这里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魏晋之际的名士群体，虽然表面上行为放荡，但其内心中则充满着痛苦，他们对礼法具有更纯粹的执着与追求；此外，他们的任性行为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拒绝与司马氏统治者合作。就玄学思想而言，他们高唱“越名教而任自然”、“礼岂为吾辈设”，其言行体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不过，西晋立国之后，门阀士族社会在思想上调和儒玄关系，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二者之间在本质上“将无同”。《世说新语·文学篇》载一事云：“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这一故事《晋书》载为王戎与阮瞻的对话，但无论如何，都体现出当时士族社会名士群体主张儒玄合流的思想倾向。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士族名士代表人物在言行方面简单地模仿魏晋名士的放荡无礼举止，其言行必声称以“正始”、“竹林”名士为准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其内在的精神苦闷与痛苦，可谓形似而神不似。对此，东晋前期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卷二七《刺骄篇》中指出：

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

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学，犹以跣蹕自病，得失财不相补。向使二生敬蹈检括，恂恂以接物，竞竞以御用，其至到何适但尔哉！况不及之远者，而遵修其业，其速祸危身，将不移阴，何徒不以清德见待而已乎？……今世人无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是丑女暗于自量之类也。

葛洪以为汉末戴良、魏末阮籍之放达，其本身有“才学”和“自然”，而后来的模仿者则根本无其“才学”和“自然”，有如东施效颦，丑态百出。同时应詹也有类似的想法，《晋书》卷七〇《应詹传》载其言论：

性相近，习相远，训导之风，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又，东晋后期的隐士戴逵对此辨析更为清楚，《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载其论云：

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戴逵将“竹林之为放”与“元康之为放”加以分别，以为“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以上都明确指出元康士风与正始、竹林风气的差异及其危害性，启人深思。

西晋立国，特别是在晋惠帝元康之世，虚诞与淫靡风气极为盛行，成为当时士族社会的主流风气，其代表人物以王衍最为典型。《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载其自少受玄化风气的影响，“口不论世事，唯雅

咏玄虚而已”，深得当时士族社会赞誉。晋武帝曾问王戎“夷甫当世谁比？”王戎以为“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这样的人物，如果个人仅以玄谈为务，真的不参与实际政治，未必能造成严重的祸害，但实际情形正好相反。他曾做元城令，“终日清谈，而县务亦理”，随着其名望的不断提升，其政治地位也日益提高，最后位列尚书令、太尉，成为晋末最具权势的人物。其本传述其谈玄及其对士风的影响曰：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①

由此可见，在王衍等人的影响下，“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以致“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的情形。又，《世说新语·轻诋篇》“桓公入洛”条注引《八王故事》曰：“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王衍身为最高执政人物之一，根本“不以事物自婴”，并成为官场效仿的对象，这必然对当时的士族政治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因为如此，直到东晋时期，一些务实的士族人物如庾翼、桓温等都批评王衍。^②

① 《文选》卷四九《史论上》干宝《晋纪·总论》注引王隐《晋书》载：“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这里指出了王衍崇尚《庄》、《老》，“不治经史”的学术文化特征。

② 《世说新语·轻诋篇》载：“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七七《殷浩传》载庾翼贻书殷浩有言：“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转下页注）